

“同类意识”在中国的历史考察

陈 树 德

“同类意识”最先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引进，为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阶级意识”即成为“同类意识”的对立面。东方文化（玄学）派认为，中国未尝存在“阶级意识”，应该日求扩大“同类意识”——内圣（心性）之学，力主走儒家资本主义之路；西化（科学）派倡导走欧美工业化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则以造就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矛盾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却把重点放在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方面，对其作为物质内容的生产力则有所忽视，由此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阶级意识”几成“社会意识”，最终导致十年浩劫。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不应片面强调“阶级意识”，而应广泛运用“同类意识”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作者：陈树德，1938年生，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研究室副教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模仿论、兴趣论、欲望（或曰感情为社会势力）说、同类意识说，及本能论等社会学中的心理学说，风行于世，极有势力。这些社会心理学说，用心理观点从各种视角解释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到一点，就是认为社会现象是人类心理的表现，心理因素则是社会现象的原动力。鉴于同类意识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且对中国知识界有着久远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剖析同类意识说在中国的沿革、影响，及在与阶级意识说的冲突中折射出的社会变革的曲折性，并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迪。

同类意识 (*Consciousness of kind*)，后来重新表述为“多数人的行为”。这个概念为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 (*Giddings, Franklin Henry, 1855—1931*) 所创，指一种超出了纯生物范畴的社会心理现象。意思是说，一个人看到和理解到别人的行为同本人的相似，从而产生了一种同类的感觉和同情心。一切社会组织、社会团结、合作，以及社会适应之推进，均有赖于此种含有同情与知觉之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基础。

从西方社会学史看，20世纪初，社会学的中心由欧洲逐步转移到后来居上的美国，由于“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生物有机论观念和机械唯物论观念的危机，暴露了早期实证主义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是软弱无力的。”因而，“斯宾塞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 思想的

影响急剧下降，各种心理学观念被提到首位。”^①于是新实证主义学派便应运而生，而吉丁斯正是这个学派的中坚人物，在国际社会学界被公认为是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学说自然就得到广泛传播。在亚洲，同类意识说最先为日本社会学家有贺长雄、岸本能武太所接受，并著文介绍，继之由章太炎引进中国思想界。^②

作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对于西方社会学发生兴趣始于上个世纪末。继严复在《原强》（1895）一文中论述斯宾塞及其社会学后，1898年，他和曾广铨把《社会学原理》译述成《斯宾塞尔文集》，分十四次连载于《昌言报》，宣传社会进化的不可抗拒性，着力论证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变革潮流，以此对抗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其时，他同康有为、严复等人一样，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十分赞赏。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斯宾塞那种具有庸俗唯物论倾向的社会有机论，显然令他愈来愈不满足。而《社会学》一书兼取斯宾塞和吉丁斯两家的社会学见解，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

首先，斯宾塞是进化论的最早创导者之一，提出了社会有机论，深信社会进化的必然性，承认万事万物的规律性，却将社会比作生物有机体，视社会阶级是一种自然分工，类似动物器官有营养、分配和调节三个系统。斯宾塞的社会学以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作为立论根据，“排拒超自然说”，忽视了社会与有机体的相异之点，即：社会各组成部分是有意识的动物；社会无本体以外之存在目的。这就必然导致其不能不掉入庸俗唯物论的泥潭。尽管斯宾塞在他庞大的社会学体系中充分运用人类学、人种志学和历史发展总理论等具体的历史材料，却很少顾及到当代与未来的社会发展。与此截然不同的同类意识说，则认定社会各组成部分是有意识的动物，故应以主观意识（“宗主执意”）为中心，而把事物变化当作来去匆匆的旅客（“而宾旅夫物化”）。

其次，人是社会的动物，但其社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心与体、社会性与非社会性（即冯友兰所云“人之正性”与“人之辅性”^③）不断互动和抗衡的产物。因此应该从生存竞争中探寻人类合群的原因，及社会性的产生。

第三，社会无本体以外之存在目的。社会的目的在于“以完具之个人，成完具之社会，得完具之幸福”，而召至完具幸福之要件，一为天然征服，二为改良社会，三为个人教育。“人之性质，自有万殊，而社会进化，必要分业发达，故人必从其性质而从事于专门……。故分业既盛，当使人人皆受普通教育，至高等教育，则从其所长而授之，然若人格完具，而天然征服、社会改良，一切可以进步。”^④

基于以上内容，章太炎高度肯定了“同类意识”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他说：“美人葛通哥斯（德案：吉丁斯的旧译名）云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傲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仿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族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并对岸本氏的著作亦作了中肯的评价：“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虽异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在章太炎

①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所编，毕裕华、蔡振扬译：《二十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15页。

② 《社会学》是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于1900年出版的著作。1902年，章太炎在日本购读此书，深感兴趣，“乃料简其意，译为一编”，分上下二册，于同年8月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普通社会学著作全译本，较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还早一年。

③ 详见冯友兰著：《新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32页。

④ [日]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社会学》，第6章：《社会之目的》，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8月版。

看来，岸本氏折衷社会学上心物二派的理论，虽然并非创见，但他不墨守斯宾塞的学说，其胜人一筹之处，是把“藏往”（历史）和“知来”（未来）密切结合的未来取向。这种着眼于社会进化，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学说，更能说明今胜于昔的历史进化论，对于宣传社会变革，促进人际关系，加强“求群”“合群”，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极为需要。章太炎对西方社会学中进化思想的取舍、改制，是和他从赞助维新到投身革命的革命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之所以以最快的速度译述、出版《社会学》一书，是有的放矢地为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

后来，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指出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未能形成统一的思想，也就是心理建设不够，从而提出“知难行易”的命题，强调“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批判“知易行难”和“知行合一”的传统古说，与人类进化相适合，提出知行进化的“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时期，并据此将人划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三类，强调先知先觉的领导作用在于日益扩大同类意识，以求达到促进社会建设之目的。

二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把同类意识与阶级意识加以对立者，当首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曰：

以吾侪诵法孔子之中国人视之，所谓社会道德，最少亦当以不相嫉为原则。同类意识，只有日求扩大，断不容奖励此意识之隔断及缩小，以为吉祥善事。是故所谓“阶级意识”者，在吾侪脑中殊不明了，或意可谓始终未尝存在。^①

《先秦政治思想史》问世于1922年12月。其时，经过五四反传统（主要指儒家传统）的战斗洗礼，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和发展，全盘西化的论调亦甚嚣尘上，不堪于耳。1920年春天，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面对这两股强劲的西方文化之风，他钟情地叙述着欧洲的混乱和悲观主义。他认为，科学在现代欧洲文明中已经赢得了绝对的胜利，但现在在凋谢干枯的、机械唯物论的西方，人们却被赋予无人格、不安全感、忧虑、疲劳、闲暇的遗失以及对扩张欲凝集的恐惧和丧失自由等特征。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贫乏症。而疗治这种“西方病”的有效处方则是以“精神为出发点”的东方文化。他在《欧洲心影录》中，辛辣嘲讽那些“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的”西化派，并明确表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进而提出对社会主义的商榷，而对那些夜郎自大的复古主义者亦持否定的态度。他大声疾呼，要有一个“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号召学人要运用西方观念研究它、综合它，使之形成一个“新文化系统”，以有所贡献于全人类。^②梁启超的这种思想观点，后人名之曰“东方文化论”，其核心就是“尽性主义”，即强调“心”对“物”的征服，要人们“裁抑物质生活”，以“使吾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于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③因为人生的意义，“不是用算盘算得出来的。”^④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发挥光大“修己安人”的儒家之人生哲学以“陶养人格”，才能使“精神生活之向上”。他说：“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

① 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2页。

②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3页。

③ 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83、87页。

④ 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3、84页。

又说：“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①他认为，儒家的内圣之学，讲求人际关系，以“仁”、“恕”为出发点，“以己度人”，何来阶级斗争之有？当然“阶级意识”也就“始终未尝存在”，而“同类意识”却应当“日求扩大”，以实行“仁的社会”，也就是要“有同情心的社会”，“同类意识与同情心发达到极量，而行之有‘自强不息’。斯则孔子之所以为孔子而已。”^②足证梁启超心目中的“日求扩大”的同类意识，就是修己、齐家和治国须臾不可离的道德意识，通常称为内圣之学；中国传统的内圣之学，即心性之学，也就是梁启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内发的心力”的“芽种”。他说：“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引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主。以上五类（德案：指儒家之人生哲学、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佛教、文学美术、中国历史）实为其芽种。”^③也就是说，只有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吸取动力，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造就新国民，创造新中国，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外王）的时代使命。

综上所述，梁启超基于对中国文化的诚意之上，率先用“同类意识”对儒家思想加以诠释。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是援西学入儒的一个显例，它一方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吸引西方文化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传统文化，从而获得“儒家思想之新开展”，并将此看做是“民族文化复兴之新机运。”^④从这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实是东方文化思潮的滥觞，为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的精神方向开了先河。

所谓“返本开新”，就是用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圣之学，去开出当代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因此，返本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在超越传统的基础上再建传统，以调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而对文化变迁的态度，则是以对“传统”的不同看法为转移的；中国的传统当然不只是儒家，但与西方思想和现代发生关联的，必以儒家为主，所以，在中国的社会变革问题上，就是以对“儒家传统”的不同看法为转移的。现代新儒家对儒家传统的诠释和弘扬，本质上与梁启超的毫无二致，可谓一脉相承，但由于他们同样没有挣脱“中体西用”的教条的束缚，必然会产生排共（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的政治观。

三

如前所述，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界，除了东方文化派和呼唤全盘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西化派以外，还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深入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物，也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不过，这是一种“西方的反西方思想”，即反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此种思想又经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发展成列宁主义。这种俄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重点阐发的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学说，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给彷徨无适的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新路，因而就较各色各样的西方思想，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终于后来居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社会主义学说和我国固有的大同理想较为贴近，容易沟通，而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缓慢而持续的发展，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奠定了现实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

① 梁启超著：《儒家哲学》，载《饮冰室诸子论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3页。

② 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3、84页。

③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6页。

④ 贺麟著：《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载《文化与人生》，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

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也就在历史的矛盾中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我党纲领如下：1. 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2. 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3. 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①这个取法于俄共的纲领充分体现中国革命的历史的矛盾，那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就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直接提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造就和壮大具有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队伍正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前提。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唯物史观为内核的“阶级意识”和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各种非马列主义思想之间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论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21—1924年的东西文化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东方文化派开始打出“东方固有文化”的旗号，旗手是梁启超和梁漱溟，继之以玄学派（以张君勱为先锋）的面目出现，认为人生观是纯主观的自由意志，“无是非真伪之标准”，“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他还用“自由意志论”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少数政治家“自由意识”的产物，是“政治家意志教育的结果”。西化派起初打出“实用主义”（如胡适）的旗号，继之以科学派（以丁文江为先锋）的面目出现，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但他认为心理上的内容都是科学的材料，物质本来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人的认识就是认识这种“觉官感触”，在此之外有没有物质都“不可知”，都要“存疑”。

陈独秀旗帜鲜明，指出了丁文江（在君）“大攻击张君勱唯心的见解”，其实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科、玄二派是唯心主义的一丘之貉，都不可能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史观’。”^②瞿秋白同样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不仅认为人生观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产物，而且对于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等论著中鼓吹的“心”对“物”的征服，及同类意识说，给予严厉的批评，他说，“讲到东方人的习静养心、征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欲，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③至于说到同类意识，瞿秋白则辛辣嘲讽道：“难道人群的集合是先由脑子里长了一‘同类意识’的神经，然后再发生的吗？原始共产社会里的种种习惯，如共同渔猎，平均分配的道德等，却是合群的生存竞争（经济关系）所养成的人生观，并非先信仰了共产主义，——先到19世纪末听了社会主义学说，再回到古代去组织共产社会的。心理作用并非社会之主要元素，而是社会关系所能左右的。”^④

瞿秋白进而认为，社会学里的唯心派“以为社会是心理的而不是物质的。依他们的意见，社会是无数意志、思想、感觉、愿望互相组成的，换句话说，就是只有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社会‘精神’。”而社会学里的唯物派则与之截然相反，认为社会决不是什么“心理的机体”，也不是什么“意见之总和”，而不过是“生产的机体”，或者说是“劳动的组织”，因而在研究

①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大”前后》（一），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

② 亚东图书馆编辑：《科学与人生观》（陈独秀序），第11页，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2，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2，第405—406页。

社会现象的时候，“只能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里去找解释。”当然，“唯物论并不否认那所谓‘思想’是有所作为的。‘假如一种理论能为群众所欢迎，他便成为一种社会力量’。”^①

胡适虽然承认“唯物史观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但他不是唯物史观论者，而其对于科、玄论战所以发生的动机却作了透辟的分析：“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②从这段话来看，胡适显然是站在科学派一边，为科学派张目；科学派即是西化派。而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表象上看虽然同受西方文化的薰染，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西化派却是新文化活动内部分化出来的两翼，原本在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下共同从事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后从文化观的不同，延伸到政治观的分歧，导致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前者力主俄式革命之路，后者则倡导欧美工业化之路。玄学派大肆嘲笑“科学破产”，重弹东方文化论的老调，坚持走儒家资本主义之路，不仅遭到科学派坚持的科学理性精神的冲击，而且其“境者心造”的唯心主义本质，也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揭露。在两面夹攻之下，撤乱旗靡，溃不成军，终以失败告终。科学派发扬了五四的科学理性精神，却导向压抑人的意志自由，这样又背离了五四倡导的个性自由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驳斥了在人生观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但由于单纯强调人生观的客观性，因而有些论点已带有某种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这种倾向如果说在1924年前仅仅反映在文化活动中，那么自1924年后则就表现在政治运动中。

四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伟大胜利。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确切而言，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之下，走俄式（暴力）革命道路（当然具体形式有所不同）取得胜利的，也就是在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引下取得胜利的；建国以后，我党提前实行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依然效法苏俄模式，即经济领域推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领域突出阶级斗争与国家专政职能，文化教育领域则强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时刻不忘批判资产阶级。

然而，如前所说，中国是在没有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就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直接提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在这种历史的矛盾中进行的。值得引以为自豪的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中国的旧式农民占绝大多数这一基本事实出发，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的农民战争。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视中国传统文化为封建文化，视西方文化为资本（帝国）主义文化，采取了相当严峻的批判态度，但限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解决这种文化上的矛盾，只是到了建国以后才被提上议事日程。从50年代中期开始，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从《武训传》、《红楼梦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2，同前，第14页。

② 《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序），同前，第8页。

研究》以至胡适派、胡风派的思想，批判声浪势如破竹，一浪高过一浪，对封建文化则掉以轻心，这样就使封建文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掩盖下得以整合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加之斯大林主义的影响，造成“左”倾路线反复出现，如反右时期，如文革时期。

在“左”倾路线肆虐时期，五四以来从西方陆续传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科学，均在批判之列。同类意识说当然也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厄运。先是1955年出版的前苏联两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权威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译本，对流行于美、英、法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严加批评，斥责其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目的在于证明人们的心理是社会的基础，它决定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而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宣称的人们的“感觉、思想、才能和愿望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正常的”人类心理的必然结果，则是“发展了心理学派的反动思想。”^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则认为，“这一类观点，不过是用对于社会现象的最皮毛的观察来求得合乎资产阶级需要的结论。”^②后者的观点源于前者，却又明显的打上了时代印记，论者以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例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上基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反对的态度，这只是少数人，另一种是赞成和拥护的态度，这是几亿人的态度。后一种态度能够战胜前一种态度，当然也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右派分子无论怎样精通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无法改变几亿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③

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具体反映在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在经济领域，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实现消灭私有制达到生产关系上的不断革命的目的；另一条战线则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长期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④“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⑤

从这两条文革中人们熟知的语录可以想见，毛泽东所接受、理解和付诸实践的唯物史观，重点在革命和阶级斗争，也就是在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偏于分配）的变革方面，而对其物质内容——生产力（偏于生产）则有所忽视。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确乎重要，但从发展（建设）的观点来看，就显然是一种偏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废？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跟他的前辈李大钊一样，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现实结合在一块，并用阶级斗争贯串历史观（过去）、经济学（现在）和社会主义（未来）的理论。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具有革命实践性格，那么，这种实践性格主要体现在阶级斗争上。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使这种性格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终导致十年浩劫。

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决定的，因而实践这种斗争哲学，应从改

① 罗森塔尔和尤金合编：《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9页。

② 胡绳著：《寒下论丛》，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页。

③ 胡绳著：《寒下论丛》，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页。

④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5卷，第390页。

⑤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5卷，第403页。

变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着手，强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进而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无独有偶。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十分注重阶级意识，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说：“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把人类从即将到来的灾祸中解救出来。换言之，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与此相关的人类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① 诚然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的思想（实践）之间不尽相同，但就重视意识形态和扩大阶级意识而言，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许可以彼此印证。

作为社会存在的哲学表现，唯物史观本身同样属于一种观念形态，其最显著的特点则是阶级性和实践性。自从唯物史观被介绍进中国以后，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赢得愈来愈多的革命青年的信从，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它便成为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②

历史唯物论加速了中国哲学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不仅使中国的无产阶级日益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相对立的，因而在面对剥削阶级的剥削时获得了一种凝聚力，继而在革命胜利以后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其历史作用人所共睹。但由于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突出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意识，几乎以之替代社会意识。

所谓社会意识，相对于个体意识而言，是指整个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集团的精神生活过程和观念的关系，它具有复杂的结构和不同的水平，包括不同的形式。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和科学理论，以及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民族心理和精神生活习俗、传统等，都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③ 由此看来，阶级意识只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思想，它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具有巨大的动员作用、改造作用和组织作用，但如果仅仅强调它在建立新制度、消灭旧的经济基础和旧的阶级中的作用，那么势必会造成长时期的滞留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且最终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诸如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其实，如果撇除哲学史上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争论，那么，同类意识就是社会意识。同类者概指人类也。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在每个历史阶段，人类确实存在着群体的自我意识，即同类意识，即使是阶级意识，如从广义上理解，实际也是一种群体的自我意识。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不应片面强调阶级意识，而应广泛运用同类意识，如法制意识、民主意识、道德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放意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心同德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

责任编辑：张宛丽

① [匈] 卢卡奇著，张西平译：《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19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6页。